

“中泰一家亲”的践行者：诗琳通公主

□ 彭 毅

2019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绿植点缀、鲜花吐蕊，气氛热烈庄重，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授勋台正中，亲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逐一颁授勋章奖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仪式上，身着对襟紫色套裙的“友谊勋章”获得者——泰国诗琳通公主作为获奖代表发言：“‘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们六位友谊勋章获得者都将自己视作中国的朋友，并愿为促进我们各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事业贡献力量。”

诗琳通公主慷慨激昂的话语，引领人们的思绪穿越历史烟云；佩戴在她胸前的这枚沉甸甸的“友谊勋章”，见证着中泰两国历久弥新的情谊。

（一）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1955年4月出生，是泰国九世王普密蓬·阿杜德和诗丽吉王后的第二个女儿，自幼聪颖好学。1973年，18岁的诗琳通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考入朱拉隆功大学语言文学系，后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荣获金质奖章。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先后获得东方文学考古学、语言学硕士以及教育学博士学位。1977年12月，她被册封为王储，封号为“玛哈扎克里”。

诗琳通从小就从广播里听到过新中国的声音，认识了新中国。1975年7月，中泰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读书求知，懂中文能懂得更多知识。”母亲的教诲为诗琳通打开了学习中文的新窗。1980年，诗琳通师从北京大学傅增有等教授学习中文，当时她已在泰国红十字会任职，既要跟随父母走访乡邻、参与扶危救困的活动，又要代表王室出席各种重要仪式。但她把学习中文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做到思想上不松懈、学习上不松

劲，潜移默化中，诗琳通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得到迅速提升。

1981年5月，诗琳通首次访问中国，从此矢志不渝为中泰两国友好交往事业奋斗了40多年。作为泰国首位访华的王室成员，抵京当晚，邓颖超拉着她的手深情地说，访问将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将对中泰友谊发展作出贡献。

在与邓小平会谈时，诗琳通动情地表示，泰中两国关系密切友好，有着许多共同的传统和感知。初次访华，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愿错过任何一个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机会。在北京，她探访少年宫，与同学们一起观节目、赏歌舞，亲切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在陕西、云南等地参访时，人们时常会在田埂上、果树间、农舍前发现她手捧笔记本认真记录的身影；在四川崇英公社村民何中全家，诗琳通看得仔细、问得真切、记得认真。老何幸福地告诉她：共产党好，岷江水甜，老百姓打心底里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通过一个多星期的参访，诗琳通目睹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返回泰国后，根据这次难忘的访华经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踏访龙的国土》。

（二）

为了进一步读懂中国、了解中国，40多年来，诗琳通不畏严寒酷暑，不惧山高路远，常常挤出时间到中国参访，至今已近50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伟大成就，让她难以忘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中国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记录者，诗琳通创作、翻译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中文作品，为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平沙万里行》《诗琳琅》《蝴蝶》等作品中，诗琳通用泰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典雅优美的文字，介绍了古老而又现代的真实中国。在她的影响下，数十万泰国人民来到中国参访，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近几年，诗琳通也尝试运用新媒体向泰国人民分享中国故事，呈现形式更加多元化、国际化，成为一个个“有流量”的公众话题。这对于帮助泰国人民更好地认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促进两国间的友好交往起到积极作用。

诗琳通非常重视通过重大节日、参加重要活动等讲好中国故事，主动承担起让泰国人民能听到并听懂中国声音的责任。从多次亲临唐人街、向华侨华人拜年、共同欢度新春到留学北大研修中国文化和历史；从见证中泰两国多所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到推动开设培训专业人才的“鲁班工坊”落户大城技术学院；从考察湄南河西岸的火船廊修缮工地到参观“秦始皇——中国第一个皇帝与兵马俑”文物展……诗琳通身体力行，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通过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拉近中泰民众的心理距离，传递出中国立场、中国观点和中国态度，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012年4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来访的诗琳通并表示，多年来，诗琳通公主坚持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积极向泰国人民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发展变化，为增进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中泰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地理相近，血缘相亲，文化相通。作为

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诗琳通40多年来始终致力于传承中泰千年友谊，始终坚定同中国共产党在两国的交往合作上保持一致，坚决贯彻执行中泰两国友好合作方针政策。她曾参加我国庆祝香港和澳门回归、北京奥运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在面对西方敌对势力不断抛出的“中国威胁论”以及在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诗琳通始终坚持原则，把中泰友好合作一步步推向前进。2008年，在得知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她心系中国人民，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后为重建绵阳市先锋路诗琳通公主小学捐款上千万元，并多次专程前往学校看望师生。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后，诗琳通与中国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间组织负责人以通话、信函等方式保持沟通、彼此支持、相互鼓励，体现出“中泰一家亲，患难见真情”的可贵友谊。2022年2月，诗琳通亲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

泰国有句谚语：撒什么种子结什么果。在泰国北部山区，中国的节水梯田模式让当地老百姓致富增收；在湄公河平原地区，中国新型绿色化肥促成香蕉产量提高20%，受到蕉农的普遍欢迎；在乌汶府诗琳通水库，整齐密集的太阳能板如同一座座深蓝色的“能量之岛”，实现了浮体光伏与水电设备同时发电，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4万多吨。十年来，中泰两国始终着眼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不断用实际行动丰富和拓展中泰命运共同体理念，两国传统友谊在交流互动中不断深化。



罗 思 文 （Henry Rosemont Jr.）193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父亲是芝加哥印刷工会成员，弟弟是美国最老派的激进劳工出版社——查尔斯·科尔发行公司编辑。浓厚的左派家庭氛围对他影响很深。18岁，他参加朝鲜战争，第一次来到“东亚”，第一次深切理解了战争的疯狂。回国后，罗思文进入伊利诺伊大学读书，并于1967年取得华盛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逻辑、语言和禅学。1972年，罗思文担任《东西方哲学》杂志的书评编辑工作，为推动东西方哲学思想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1982—1984年，1993—1994年，罗思文曾两次在复旦大学出任福布莱特高级教授。

对儒家经典的翻译

西方人与儒学结缘，首先体现为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对罗思文而言，翻译问题其实是讨论现代英语对古代汉语的转译。古代汉语音形兼备，依据语境，词性流转极为频繁。所以，他主张古代汉语是一种分析的语言，其基础是“事件”而非“事物”，无需进行专门的性、格、数等概念区分，而是要重点关注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这就要求，翻译时一方面要将这些联系、互动的动态机制和过程尽可能复原，后者具体而言是语义、语法和语音三种性质的多重组合；另一方面还应把相关注释也看作文本自身的组成部分，通过文本和注释的相互证成，使得事件发生的语境也可以被还原，从而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经典文本的真正意义。

除了机制和语境的还原，概念的选用也非常关键。在罗思文眼里，儒学本质上是“伦理思想”，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道德知识和道德哲学，所以在概念上自成体系，其中有几个词项最为显要，即天、仁、义、礼、知、孝。对它们的翻译，罗思文认为应当秉承其本身的多元内涵，不能用英语里的某些概念强制性替换，必要时不妨选择音译和解释并行的策略。

在罗思文看来，翻译既然是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就无法避免误解。预防、消除误解的方法，不能完全依靠现代语言学的那些偏重技术的手段，同时也应当在儒学中发现更周到的“方便法门”。那就是采用中国传统治学中堪称典范的方式，比如感通（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涵泳（对文学艺术鉴赏的一种态度和方法）等，同时借助天地自然间发生的各种“象”的启示，格物致知、周而复始，不断促人由迷途而知返。

儒家角色伦理学

西方人进入儒学，重要的不是寻求趋同，而是重视差异，即利科所说“差异是理解的开始”。在罗思文看来，儒学之所以异于西学，在于提出了以家庭为本位的集体社会思想。真正的个体不能千篇一律，而要追随生活境遇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描述了一人一生面相的总和，于其中动容周旋，才能够进化成长为君子的形象，人生意义才可以广布而远播。他们对施于自身的责任，怀有非同一般的虔诚，愿意为之蹈水火，乃至杀身以成仁。在《反对个人主义》中，罗思文感叹道，“儒家可以说颇具宗教之实，只是其传统里不曾有蹒跚独行的僧侣、隐士。诸人争行，从而方有大道通衢”。

虽然如此，却不意味儒学与“个体”概念是对立的。罗思文认为，真正与儒学相对反的，其实是“作为权利承担者的个体”。后者由笛卡尔的认识论反思而来，强调人本质上是“进行自由选择的自主存在”，而且通过宣传和诉诸法律等，将其由西方工业主体制的文化现象转变为普世价值的道德标准，它武断地超越了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与历史上的差异和多样，用“权利”概念强行消除不同文化间相对的独特性，认为谁都应该无条件接受它。

而儒学信奉的人性更加自然，儒学的人性划分是更加立体的“角色”维度。相似情形在古希腊城邦也发生过。民主时代的城邦公民因为自身的优先而被赋予不同角色，同时所有城邦角色最终都维系于城邦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即大写的人或城邦公民。与如此角色化的个体相一致，罗思文指出儒家所秉持的是一种角色伦理学。其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反对以权利分配的功利视角作为出发点，提倡在角色综观的视野中去评价个体行为的善恶。这样的伦理学在原则上是秩序

美国汉学家罗思文：让儒学回归价值主体

□ 刘 岱

从严、道德宽泛的。

儒学与西学的互动

西方人对儒学的解读，通常有宗教化、疑古论和哲学式三条进路，罗思文是最后一种的代表人物。但与常见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不同，他更多受现代哲学影响，对儒学根本持非本体论的态度。正如《儒家角色伦理》“跋”中所说，“一个人，在何种方式上，‘变为’完美无缺的人呢？这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中构成了儒家恒久不息的追问”。其意味着，一旦使用本体论的、教条的范式去解释儒学，就会破坏后者的生命形态。只有让西学直面面对儒家经典，通过两者平等对话，“揭示”儒学对西学直接能发生的意义。

现实中，最令罗思文揪心之事，莫过于儒学迫于现代性的压力，长久以来在西学面前不得不摆出一副谦卑的姿态。他要让儒学以价值主体的形式立于西学面前，两者进行主体间的互动，且相互牵引。只有进入此境遇，儒学才可以改变长久以来的弱势局面，不仅能与西学别开生面地交通，而且也能反过来教化、培育后者。那正是西方研究儒学的最终价值所在。在《〈论语〉读者指南》里，罗思文写道，“儒家‘之道’的核心要素在于，其中遍布了各种特殊的人性之路，我们每个人势必走入与自己的历史、系谱、天分和个性最相适宜的那条”。

这条道路，属于就儒学而言的哲学诠释学进路。当代，从哲学出发进行的中西对话一直处于演进过程中，康德哲学、海德格尔哲学等被接连引入。罗思文无疑又做了新的路径探索。他的探索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时效性，反思了西方现代个体文明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并试图从儒学中引入对治的方案。以期这些方案促使西方社会形成改良与进化的内生动力，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罗思文的观点呼应了当今一些人文学者的思考，将更多西方人吸引到儒学研究之中。

罗思文先后出版了《〈论语〉读者指南》《反对个人主义》等作品，与安乐哲合著了《中国家庭尊崇之经典——〈孝经〉的哲学翻译》《儒家角色伦理》，除此之外还发表了《中国之镜》《克爾凱郭爾与孔子——论路径发现》《孔子——人间的圣贤》等一系列理论文章。他的研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同时，罗思文不仅把儒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且要使之走入一般西方民众的生活，变为他们喜闻乐见的现实体验。



孝道与养老

□ 郭代杰 魏富敏

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思想源远流长，历代统治者皆将养老制度系于治国安邦的高度，而民间百姓也将尊老养老视为道德高下的标准之一。无论是国家层面、家庭层面抑或社会层面的养老制度和风尚，无不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一）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将养老纳入制度设计之中，逐步形成了古代养老体系的雏形。“三老五更”制度给予老人尊崇的社会地位。

秦一统天下后，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统治思想，将“不孝罪”编入法律，运用严刑峻法规范养老问题。汉承秦制，且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在法律层面出台一系列尊老、养老的政策法令。

到了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上下失序，“以孝治天下”的理念更是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养老措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肇始于南朝的官方养老机构“孤独园”，由国家出资，对孤独之人提供衣食住所，以终其身。

隋唐时期是中国养老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上承秦汉至魏晋的以孝治国理念，下启宋元明清的养老制度规范。唐朝开创了独特的侍丁养老之制，侍丁依律可免役，只输调租即可。

宋元时期，政府在承继前代养老制度的基础之上，又大力发展并完善了养老制度。宋初，太祖便诏令天下“举孝悌彰闻”，并将孝道教育定为国策。为鼓励家庭养老，政府要求子孙必须与老人同居以便照顾。除此之外，还广设官养老机构。元朝沿用两宋的养老制度，忽必烈还下诏规定不仅要应收尽收老弱残疾之人，还要对其进行监督与纠察，防止徇私枉法，确保政策落实落细。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便下令各郡县建立养济院；在赐物政策上，更是对老年人赏赐这一习俗制度化。到了清朝，政府进一步完善了侍丁制度与赐物制度，并严格管理养济院，将养济院经营良善与否和其政绩挂钩，作为其陟罚臧否的考核标准之一。除此之外，清朝统治者还多次举办“千叟宴”，以示对老年人的尊崇。

纵观中国古代养老制度，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养老问题，宣扬尊老养老。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倡导的“孝”与国家养老制度挂钩，紧密相连，成为贯穿中国古代养老制度的精神内核。

（二）

国家养老为“老有所养”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家庭养老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悠久的养老模式，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养老方式。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家庭成为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家庭养老是古代养老的基础与核心，是传统养老保障的基石。

在家庭养老领域，“以孝事亲”的伦理观念贯穿始终，集中体现在子女要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物质帮助、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多方面的悉心供养，明确了家庭养老保障的范围、任务和责任。

一是物质供养。《孝经》中讲道：随着父母年老体衰而难以独立生活，子女须为父母提供物质生活条件保障，确保父母饮食起居得到相应照料，这是家庭养老的核心义务，亦是子女赡养父母的首要责任。二是忧亲侍疾。随着父母年长力衰，患病风险增加。《礼记》中指出：父母生病时，子女要心中常虑，不事打扮，不行娱乐，直至父母病愈才恢复正常。此

外，父母患疾，子女还要亲尝其药，贴心服侍，尽力做到寸步不离。三是敬爱顺从。子女要恭顺敬爱父母，对父母要和颜悦色。《礼记》认为：敬爱是顺从的前提，顺从是敬爱的体现。四是以礼丧祭。生老病死乃人之规律，儒家所倡孝道既重“事生”也重“事死”，养老与送终都是孝亲的关键一环。以礼丧祭本身具有倡导孝亲敬老的教化作用。

（三）

中国古代的社会养老思想，亦和先秦时期“尊老敬老”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儒家的“仁者爱人”主张“人不独亲其亲”，强调老有所归、老有所安、老有所终。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主张把“孝”兼济天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养老理念，建构了由亲到疏、由近及远的社会养老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养老实践。

家庭养老的外延——宗族互助性养老，是影响十分广泛的社会养老实践。宗族组织对于无所依靠的年老之人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和生活照顾，宗族成员出资捐建的慈善组织——义庄，对于宗族内丧失劳动能力或染病患疾的老年人进行物质救助，在中国古代养老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间养老机构也是社会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到了明清时期，人口剧增，官办养老机构无论是从资金，还是从人力上都已经力不从心。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福利养老思想进入中国，在官办养老机构的基础之上，政府大力鼓励支持民间养老机构发展。如兴起于民间的养老机构普济堂，以收养贫病老人为宗旨，后来得到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持。

明清之际，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之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兴起

